



我与法兰西文化 三四题

柳鸣九 / 文

林森先生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业绩斐然，近年来任期刊《跨文化对话》的执行主编，把刊物办得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为了迎接中法文化年的来到，也为给中法文化交流史留下若干侧影，期刊又辟中国学人与法兰西文化之缘专栏，我荣幸地得他的盛情邀约。于公于私，都该欣然从命，全力以赴，即使当遵医嘱，宜暂停爬格子的劳作。

为法兰西文化魅力所感、所吸引，数十年来，我竭尽愚钝，庸庸碌碌，事情倒也做了一些，但概述与罗列，均不可取，不如例举与我生活际遇有关的三、四题，以述个人踽踽前行的经历，从中亦可见中国学人在风风雨雨之境况中那份割舍不了的对法兰西文化的真挚。

一、我写《米拉波桥下的流水》

我是外文系出身的，长期摆弄的是法兰西文化，可以说一辈子都是在桥上讨生活。

桥上观两岸风景的好去处，桥本身也是热闹熙攘的好景点，近几十年来，华夏大地上哪一场风风雨雨没有在桥上留下几许踪影？世界文化哪一种景观没有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丰采？

在桥上，虽然经常有悬空之感，也经常遇风雨的吹打，但自有眼界开阔、感受纷呈的逸致，我摆弄这、摆弄那，忙忙碌碌，不意桥下的流水无声地流走了岁月，时至今日六十五，不由得也在桥上叹了一口气：“逝者如斯夫。”

米拉波桥在何处？在巴黎塞纳河上，由于法国20世纪第一位大诗人阿波利奈尔曾在他不朽的诗篇里反复咏唱：“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水流”，因而更闻名遐迩，这一诗句也成为了法国人形容时光流逝的最富于诗情画意的比喻。

我借用法兰西才人的诗情，并非要附庸风雅，仅仅是因为这集子中的文章都

与我的巴黎生活以及我桥上营生的内容有关。

事实上，我在此之前的三个散文随笔集《巴黎对话录》、《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都是以巴黎生活为内容的。巴黎，我只去过两次，而且，因为都是得法方的邀请而去的，每次的时间也就不太长。短短不到半年的访问，出了三四个集子，我简直就是在挤柠檬！巴黎这个柠檬啊，你实在是太丰满了，你的汁液实在是太甘美了，令我难以自禁，贪得无厌！

巴黎是否尚有我意犹未尽、梦往神游的去处？那就是拉雪兹神甫公墓。那里聚居着不知多少高雅的灵魂，也许要算我在巴黎时去得最多的一个地方……

二、我写《巴黎散记》

中学时，从语文课本中读到了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在此之后，它那种精致的文化内涵、潇洒的神韵与绝美的文笔就一直不断“润”着我那混沌初开、尚未脱离愚顽、智商不高的悟性，那“润”，真可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润”，它慢慢地营造着一个人的精神向往与文化追求。我后来心仪国外的文化，投考北大西语系，实与此多少有关，其时，居然形成了一个朦胧的人生理想：但愿能获得如此这般的文化修养，将来能写出些许如此这般的文字……

徐志摩在康河上泛舟的青春岁月，我是在高音喇叭声中度过的，往后度过的岁月则更为酷热、更似“惨不忍睹”。直到1981年，年至四十六，都一直关在国门之内，还没有见过心仪已久的国外文化文物一眼。如果是愚昧无知，倒也罢了，不知道饥渴的对象，就不会有饥渴感，没有饥渴感，就不知道有饥渴之苦了。但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恰巧是外国的语言文化……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我辈同龄人充满了向往与期盼的精神文化生活，往往都是望梅止渴的，比如在阅读中沉醉，从背诵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的第二乐章的优美旋律中自得其乐，等等……

终于到了1981年秋，根据中法双方关于学者互访的协议，我得以第一次去到向往已久的文化之都巴黎。于是在短短三个月里，我如饥似渴、狼吞虎咽地享用着法兰西的文化大餐：到处参观访问，手里握着一支笔，拿着一个笔记本，背着照相机，不断地观赏，不断地记录，不断地拍照，街上没有一个游客像我这般贪婪、如此功利……我那毫无半点观光者潇洒休闲劲的样子，着实有些可笑。

但其结果还不错，三个月的访问，导致了两本书，其中之一就是1982年问世的《巴黎散记》。

现在想来，正因为当时是释放出那淤积了多年的文化饥渴劲，狼吞虎咽时总是拣充饥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吃，因此这个集子还算是“言之有物”，而这些“物”几乎无一不是人类文化上具有永恒价值与动人魅力的“物”，这也许是此书出版后尚得读者青睐的原因，是书中的一些文章不断被一些散文选家选入各种散文选本以至高中语文课本的原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要稍稍有点存活力，恐怕还要看它

附的是什么“皮”才行。

但是，最可忌的也正是狼吞虎咽。急促的狼吞虎咽又势必欠缺文化精神问题上所必须有的从容与细赏，我哪里有徐志摩那种全身心自由而酣畅地躺在康桥的怀里，从容品味康桥风韵的潇洒？当然，我更缺乏他那种诗人的气质与才情，我们这一辈人谁能为塞纳河留下《我知道的康桥》式的极品？

万类千姿百态，靠的就是种种因素的组合搭配。人的天分才具各异，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徐氏那样的极品也许会像米洛的维纳斯一样不可重复、永世难再。

三、我主编三卷本《法国文学史》

原《法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卷，分别在1979年、1981年、1991年陆续出版问世，时间跨度长达十二年，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三本书是陆续写成的，成书时间跨度本身就很大，而且，恰逢中国20世纪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如第一卷就是在1972年开始动笔的，那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1972年夏，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人马奉命从河南干校调回北京候命，当时的状况是“等候发落”，一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前途未卜，时有将解散的传闻，二是一大批数量惊人被打成“516”的中青年等候“平反”、“落实政策”，全学部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军宣队的全面领导下进行政治学习，学习的内容除毛选四卷本外，就是当前的政策与党报社论，经军宣队同意，有时也可以适当扩大到《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被运动、被愚弄、被教育、被整肃、被批判、被改造了将近十年，已经是身心疲惫、伤痕累累、不胜其烦、心存厌恶了，只想离现实中“四人帮”的“无产阶级政治”与“革命路线”远远的，找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蔽所，也想埋头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稍稍弥补已被耽误、被牺牲、被霸占了的十年时光（一个人一生有几个十年呢），这样，我就萌生了利用原来一点业务基础编写一本法国文学简史的念头，并串连两位志同道合的“搭档”：郑克鲁与张英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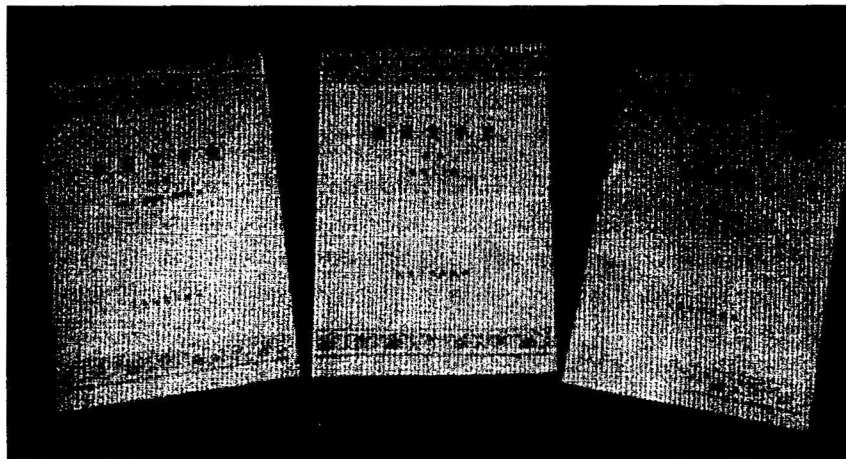
当时，学部是未完成“斗、批、改”政治任务的单位，且前途未定，做业务工作是“不合法的”，好在军宣队已在这个单位搞得筋疲力尽了，又在苦苦等候上面的指令，无所事事，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自流，满足于充当“维持会”的角色，于是，我等也就有办“地下工厂”、偷偷搞点业务的可能。

为什么想到要编写法国文学史？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建国后，国内一直没有人编写法国文学史。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法国文学简史》，薄薄的，不到十二万字，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原是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法国卷的“文学部分”，译者是我五十年代在北大时的老师盛澄华教授。因为从建国后，斯大林、日丹诺夫的文化论断一直是国内意识形态遵

奉的经典，这一本苏制的小册子一直也就享有某种权威性的地位。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辈过去所遵奉与崇拜的革命偶像与神都已掉下了神圣的面纱与光圈，苏式的偶像权威也就不在话下了，当时，我个人认定，以我们的知识积累、文学见知、鉴评水平，要编写出一本规模上、篇幅上、丰富性上超过那本苏制小册子的文学史，是满有把握的，当然，也没有敢生特别好高骛远的念头，只打算写一本四五十万字的书而已。

说干就干，郁积了好几年的对文化学术的热情一下就爆发出来了。由于我比郑、张二位痴长几岁，在学术阶梯上早爬了几年，策划、统筹、主持编写的工作重担自然就落在我的肩上。先是拟定了章节大纲，然后就要进入分工执笔的阶段。但是，不论从策划、统筹、拟定提纲、查阅资料到进入写作，都无不面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要把这本法国文学史写成一部什么样思想倾向、什么样文化态度的书，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足以影响个人命运的严峻问题。

谁都不能忘记、也不该忘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性、暴烈性与荒诞性，就其“无微不至”的程度而言，那个时期要算是人类历史上思想钳制最为严酷的一个时代，从运动之初“暴风骤雨”开始，人类历史各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就统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如果只当作“历史垃圾”弃之不顾倒也罢了，偏偏领导当局老是顾忌这些思想文化遗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对性”、“颠覆性”，而不断把它们提溜出来当作“封资修复辟的舆论工具”轮番猛批，经过十来年地毯式的轰炸，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一片焦土，寸草不生，只存在“一曲国际歌，八个样板戏”的大统一、绝对纯的始皇式的局面。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与中期还只是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马列主义秀才”率领亿万人马在“思想阵地”上横冲直闯的话，那么到了后期，则有大大小小的“梁效”与权威的历史学家、哲学史家积极参加营建这种无产阶级学术文化大统一的局面了。



柳鸣九主编的
《法国文学史》

这就是我们开始编写法国文学史时所处的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对于这股炽热可怕的时代洪流，我们这一辈时代小人物，也曾顺应过，跟随过，终究又轮到自己被冲击、被批斗，其受害之深较前届被冲击者、被批斗者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我个人而言，正因为十来年的政治现实打开了自己的眼睛，更因为自己受伤害后，伤口长期难以愈合，隐隐作痛，所以在写法国文学史之初，就怀着强烈逆反情绪，决意反当时的思想标准而行之，坚决破除四人帮对待文化遗产的“彻底批判论”，不过，我并没有走得“太远”，有所“出格”，不过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启蒙主义文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那些充满热情的评述为准绳，采取一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化历史观的立场，这在当时就已经是很背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了。因此，当时就不存在什么有朝一日可以出版问世的奢望，只不过是尽自己实现自己，对自己尽心尽力罢了。

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的时候，编写工作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与原来只一卷的计划相比，编写的规模大大地扩充了，膨胀了，仅中世纪到18世纪，就已经达到了一卷的规模，因为，一进入编写后，我们才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些年没有虚度，的确读了不少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也形成了不少见解，一写起来，就大大超出了原订的篇幅，于是就决定按“略古详今”的原则，将后来的19世纪至20世纪再写成两卷。

“四人帮”垮台，全国欢腾，各个文化单位都急于走上正轨、恢复业务工作。报刊杂志要组织若干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文章，还不那么难，但出版社要出版一点像样的文化、学术读物，却不容易，梁效式的理论大作、被“拉下水”的某些学术权威贯彻了“尊法批儒”精神的论著都无法发表出版了，深受他们影响的一些文章论著，也因为改不胜改，难以清除“梁效特色”与“尊法批儒”色彩，也都成了出版不了的废品。我们本来怀着自觉逆反意识写出来的法国文学史上册，倒是恰逢其时，与出版社一拍即合，竟未作任何修改，未加任何粉饰，在交稿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顺利出版了。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罕见的“奇迹”。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有多少“理论勇气”，但我的确对“反潮流”一语有了切身的体会，并发现反潮流带给当事者的并不一定是灾难。我后来在80年代前期拒绝意识形态领域的长官要我写萨特评价问题与反思文章的指令，实与这次经验有关。

1979年上卷出版后，中卷与下卷的写作大大放慢，经常一搁置就是一年半载，这是因为“四人帮”垮台后，有了一个外国文学的“春天”，各个方面约稿组稿很多，一些研究项目与翻译项目令人应接不暇，我自己如此，郑、张二位也是如此。但成书时间跨度拉长也有一定的好处，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个跨度里，我插进去了这样几件事：一是我写了一系列批判与清算“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想的理论文章；二是，我发动与组织了对斯大林一日丹诺夫关于西方20世纪文化

之论断的批判，并做了一系列工作对西方现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价；三是，涉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与左拉的裁判，发动与组织了对自然主义的重新评价。这三件事都有较大的工作量，除了繁杂的学术组织工作外，更主要的是我自己要作先行研究，拿出“主打文章”、“主旨报告”，虽然这些事占用了不少时间，但更深化了我对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也增加了学术上、理论上的“底气”，对把《法国文学史》中、下册写成“成熟的文学史著作”，是大有裨益的。

时间跨度拉长，还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参加编写人员的增添，除原来郑克鲁、张英伦、金志平外，最主要的是，在这个跨度期间，我作为导师带过一批研究生，其中不乏多位才俊之士，我很自然就吸引他们参加若干编写工作，虽然每个人的工作量并不大，如施康强、郭宏安、吴岳添、金德全、孟明等，如今他们都已经都是学术文化方面的名士了。而由于写到19世纪末就达了三卷的规模，自然要求每一章都具有一定的篇幅与深度，于是，有的章节就特请对该专题有研究的同志承担，如罗新璋、黄晋凯。因此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实可谓汇集了本学界一代精英的劳动。

当然，这三卷中的大部分章节篇幅都是由我执笔撰写的，如此大的工作量，我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也就三卷本的编写时间拖拉得较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1991年，三卷出齐后，《法国文学史》于1993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正因为是第一届，参评的书，据官方统计，积累了1980至1992年整整十三年，共达五十余万种，能在其中被拔出来，还算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四、我译都德

在学界，我要算是弄翻译相对较少的一个，原因很简单：能量守恒，在这方面花的精力与时间较多，在那方面能投入的也就较少。对于天才也许例外，至少对我这样智力平平的人完全如此。

不仅在这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少，而且译题也比较分散，这就像在浩瀚的译海里，这儿捞一片海藻，那儿拾一只贝壳，到头来零零星星，不成体统，不成派头，令自己也深感寒伧。到如今能够勉强构成三、四个“点”的，只有雨果、都德、莫泊桑与加缪，雨果我只译过一本文艺评论集，都德、莫泊桑、加缪也只是各一两篇小说集。

我译雨果基本上是从功利出发，大学毕业的那年，在闻家驷教授的指导下写以雨果为题的毕业论文，为了把论文写出点“学问”以利于毕业分配，便尽可能多看了一眼雨果的文艺理论，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当翻译与编辑，到这样一个学术单位里供职，总得在业务上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撑点，于是便比较系统地译起了雨果的文艺理论，总算在毕业后的两三年里把雨果主要的文艺评论译成了一本。我译莫泊桑与加缪，是在版权壁垒的境况中，为了我所主编的翻译项目能顺利出版，而不得已为之的。

我译都德则基本上与功利目的无关，而更带一些灵性的色彩。



北京大学西语系很重视文学作品原文的阅读,我们从二年级就开始在课本里读到文学作品的原文片断、章节,到三年级,自己就可以抱一部名著的原文去啃了,我最初选啃的作品就是都德的小说名著《磨坊文札》。

之所以从都德开始,是因为他的语言很纯净,适合当时规模化语言教育的要求,而且原文难度也不大,除了偶尔有一点普罗旺斯语外,很少有生僻的词汇,正适于大学生阅读。更重要的是,他那平和自然的风格很叫人喜爱,他那种富有感情与情趣而又蕴藉柔和、不事张扬的笔调特别叫人神往,在听多了高亢、强买强卖的噪音之后,这不啻是一块使人精神得到些许宁静的绿洲。

对于学外文的人来说,最大的欣喜莫过于从目不识丁到能够阅读原文,特别是文学作品原文,那就像刚学会走路的幼儿有一种本能的欢快,又像是一个人面前有了一片广阔的天空,或者有了一条开阔的道路,顿觉精神意境凭空扩展了一倍两倍……

一旦在阅读中入了港,就很容易产生翻译的冲动。这不仅有对创作领域的好奇与想尝试的愿望,而且也有未来职业朦胧的吸引,于是,在三年级的课余,我就开始译了一点都德。

课余时间很有限,当然译得并不多,只不过两三个短篇小说而已:《繁星》、《赛甘先生的山羊》与《高尼勒师傅的秘密》。

尽管数量很少,却都是我喜爱的作品,译起来也就特别投入,它们不仅应和、启发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思绪,而且还叫我搭进去不少自己的感情:

如《繁星》,少年牧人在山顶上得以与自己意中人相处了一夜的那种纯净柔情与柳下惠的自制操守,实在太迎合一个大学生将要进入感情领域有所作为的情愫状态了,而且还相当清晰地引发出对牧人式的“绅士风度”的向往,“绅士”一词虽从来都不属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品位的范畴,但今天看来,这种向往,实在是和当时亚禁欲主义的道德教育太合拍了。

又如《赛甘先生的山羊》,它比任何一课思想教育、人生辅导似乎对人更有影响与启迪。小山羊向往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它跑出了羊圈来到山里的经历与感受,的确也很新鲜、浪漫、欢快、开心,但入夜它就被狼吃掉了。都德这则寓言故事确实功德无量,他本来想对巴黎文人与自由生活作点讽刺,却“无心插柳柳成荫”,造就了我这样的人一种山羊式的思维方式,一种世俗、务实、顾及后果、因而也就不断将就羊圈的生活态度,在50年代学成的一代人中,很多很多人大抵如此。

再如译《高尼勒师傅的秘密》更是给了我深切的感动。普罗旺斯乡村里一风力磨坊的营生被城里机器面粉厂压垮了,乡人见磨坊主人痛苦不堪,全都自动把小麦送到磨坊里来维持它的运转。这是对工业化冲击下、小作坊必然的衰落命运的一曲温情的挽歌,说实话,与生产力历史发展的方向颇不相合,但其中那种宗法式的、乡土气息的共济会精神,却使我非常心动神往。这与我当时曾经有过一

段背时的经历有关:

有一个学期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是整夜失眠,就是只能入睡一两个小时,至多两三个小时,几乎每天做恶梦,很多梦都是这样可怕的:炸弹从上落下,落进自己的脑壳里,在里面爆裂开花,恶梦机制如此缺德,它让你不能动弹地躺在那里慢慢地细胞地体验炸弹在脑壳里爆炸的过程、巨响与能量……夜里如此受煎熬,而白天却要背着大书包,从这栋楼的教室赶到那栋楼的课堂,上十来个小时的课,晚饭后,又要在图书馆里苦读三四个小时……当时学校里“向科学进军”的冲锋号吹得震天响,眼见周围的同学个个紧张有序,昂扬自若,不断在“攀登科学高峰”的战斗中,节节胜利,步步攻克,而自己却在掉队,很快就要有休学一年、甚至两年的危险,心里的那份焦急、恐慌、忧虑真是难以形容……于是,我不得不每隔一天请假一次,骑车到西苑中医研究院去针灸,每天课后,还要到烧开水的锅炉房去,在一炉熊熊大火的旁边拨出一堆“文火”来熬中药……在这个时期,我特别感到周围的人每一声问候、每一份理解与同情、每一次帮助的宝贵。事实上,我也得到了一些友情的关心与帮助。负责学生工作的同班同学刘君强为减轻我的学习负担,给我争取到一个不小的特权:政治课与历史课我不用来听讲,只需期末通过考试就成,丁世中每隔一天就把他崭新的自行车借给我,让我骑着去西苑针灸,还有同宿舍的学友常向我说道他们应付病痛、健体强身之道……正因为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坎坷,所以《高尼勒师傅的秘密》中乡人那种纯朴诚挚的互助精神,使我特别感动,我译小说最后一节时,就未能像好样的铁男儿那样“有泪不轻弹”。

出了大学校门,我与都德一别也是将近三十年,这期间,我一直忙于很多别的事情,几乎没有再回到都德那里去,只是在写《法国文学史》时,又读了一些都德,完成了文学史中的都德一章,至于又译起都德来,则是前几年,起于一次偶然的触动:

在一次会议期间,我听一位与会的朋友介绍了他的乡居安排:在京郊一个山川秀美的所在向当地老乡购下了一个四合院,加以装修,形成一个乡野其表、现代化生活条件其中的野墅,每个周末就驱车去那里避开尘嚣,享受乡居生活的乐趣,或者疲惫心烦时,就去那里住上一个时期。他这种“绿色生活”使我羡慕不已,如此这般,置房费与装修费并不多,与演艺圈中人士到乡下去圈购一片土地在上面建造起自己的宅子那样的大举动、大投入相比,远为经济、省力,同样都可以享用田园生活。我不禁怦然心动了,心想这倒也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就下了决心去实施这个计划。然而新的问题、新的情况纷至沓来,不断磨损着这个决心:杂务纷繁没有时间去进行,没有车,也不会驾驶,往返城乡不无麻烦与困难,等等……于是俗务考虑逐渐就把田园冲动淹没掉了,我仍蜗居在钢筋水泥的统楼中,像奥布洛摩夫躺在床上耽于空想一样,不断地做自己的绿色梦……很自然,我想起了都德。

都德成名后,在普罗旺斯乡间的一个山坡上,购买了一座旧的风力磨坊,经常从喧闹的巴黎脱身来到这里过隐居生活,进行写作,《磨坊文札》一书的灵感与题材就是在这里获得的,它基本上也是在这里写成的。这大概是要算田园生活中最潇洒、最开



花结果、最令人神往的一例了。

一边是令人神往的绿色田园，是“磨坊”向往，一边是城市的噪音，二环路边的废气污染，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下要从一个项目忙到另一个项目，不说伏案中殚思竭虑的绞脑汁、电话铃带来的急务、琐事，而且还有人情世故鸡零狗碎所带来令人血压升高的难题，麻烦以及不痛快……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太常见了，也最为要命，碰上它，你就很难平静下来，甚至很难入眠，必须找一个逃遁所，避风港，绿色宁静的栖身之地。

然而，我没有绿色宅了，没有远离尘嚣俗务的“磨坊”，我只能望梅止渴，自我麻醉。

于是，每当我实在平静不下来，实在陷于烦躁、焦急、匆忙、眩晕的状态中摆脱不出时，我就拿起《磨坊文札》，开始是看看，后来觉得如果真要压下或消除焦急、烦躁、烦恼、火爆的情绪，最有效的办法是潜下心来，将这一恬静、平和的书译个两三段，情绪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这样，都德成为了我近年来的镇静剂，“降压灵”，需要时，就拿来用上一两小时，不需要时，就放在一边，往往两三个月、甚至半年一两年也不去碰它。

如此断断续续，几年下来，没想到把一本《磨坊文札》几乎全都译出来了，由于译得不紧不急，倒也译出了一点味道，自己读来，觉得也还很像个样子。



[244/245]



附录

柳鸣九著作与译作主要书目

一、著作

1. 《自然主义大师》，专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2. 《法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卷)，专著，主编，主要撰写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981年，1991年。1992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3. 《走近雨果》，专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专题评论文集，花城出版社，1993年。
5. 《法兰西风月谈》，专题评论文集，辽宁出版社，2001年。
6. 《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专题评论文集，漓江出版社，1991年。
7. 《世界最佳性格小说欣赏》，专题评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
8. 《凯旋门前的桐叶》，专题评论文集，三联书店，1998年。
9. 《塞纳河的桐叶》，专题评论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
10. 《枫丹白露的桐叶》，专题评论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
11. 《论遗产及其他》，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12. 《采石集》，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13. 《理史集》，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4. 《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15. 《巴黎名士印象记》，散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16. 《巴黎散记》，散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7. 《米拉波桥下的流水》，散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
18. 《兄弟我……》，散文集，东方出版社，2003年。

二、译作

1. 《雨果文学论文选》(三套丛书本)，上海译文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1980年。
2.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经典印象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3. 《都德短篇小说选》(经典印象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4. 加缪：《局外人》(经典印象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5. 《雨果美文选》(合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6. 图尔尼埃：《埃埃尔或夜的秘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三、编选(含部分翻译或评论)

1. 《法国散文选》，春风出版社，1997年。

2. 《法国短篇小说选》(上下两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
3. 《法国浪漫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4. 《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左拉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6. 《都德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
7. 《雨果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
8. 《莫泊桑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9. 《外国幽默讽刺小说》(上下两卷)，花城出版社，2004年。
10. 《法国心理小说名著选》(上下两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 《梅里美名作欣赏》，和平出版社，1995年。
12. 《莫泊桑名作欣赏》，和平出版社，1995年。
13. 《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4. 《马尔罗研究》，漓江出版社，1984年。
15. 《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16. 《尤瑟纳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7. 《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台湾淑馨出版社，1990年。
18.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意识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0. 《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21.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2. 《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3. 《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四、主编项目

1.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卷)，漓江出版社，安徽出版社，1986—1999年。
2. 《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于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3. 《世界散文经典》(八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
4. 《雨果文集》(二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于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5.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五十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于2000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6. 《加缪全集》(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于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7.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十一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8. 《名家点评本外国小说中学生读本》(十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9. 《法国龚古尔奖作品选》(十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十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11. 《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大系》(二十二卷)，长春出版社，1995—1999年。